

第七章 霞关(海军省)

1945年，战争开始无可挽回地向着失败的方向发展。面临严酷的现实，政府究竟要把人民，即国家导向何方？政府的意向对当时的国民讳莫如深，因而具有浓厚的秘史色彩。我们所探讨的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终战史。其中镌刻着战后日本的雏影。

我们且追溯当时的战争执行机构——陆海军与外务省的一举一动。

海军主张“冲绳决战”

说起霞关，人们就想起外务省。但外务省却因1945年5月25日的大空袭中被烧，而借住于虎之门的文部省，所以这里所说的霞关指的是海军省。围绕着终战，米内光政海相及海军将士们有何动静呢？我们且把目光移向当时的海军。首先，从开战时的司令部作战课长、终战时的军令部作战部长富冈定俊氏(海军少将)的回忆谈起：

“我在开战时是作战课长，在1943年1月被任命为新造的万吨级巡洋舰“大淀”号(第三舰队)舰长，同年9月又转任为东南方面舰队参谋长并去了拉包尔。我刚赴任，拉包尔就开始遭到敌军的炮击，以至于我们有300架左右飞机的拉包尔航空队，不得不于1944年2月撤离。那首‘别了，拉包尔，待我再来时’的歌声，表达了那些航空队员的心情。但是，由于没有船只，军队无法撤离。于是今村均大将所率的陆军第八方面军约6万人，和草鹿任一中将指挥的东南方面舰队4万人，计10万人，拚命地构筑地下战壕，

准备以持久战的态势抗击敌人的登陆。

到1944年11月，有命令要我归国任作战部长，但交通断绝无法成行。这时，派了一架四引擎的‘二式大艇’，到特鲁克岛迎接。为去特鲁克岛，不得不乘一简陋的‘三座水山侦察机’在夜间出发，飞8个小时方抵达特鲁克岛。记不得是11月的哪一天了，总之，我又从特鲁克岛乘‘二式大艇’，花了两天时间抵达了横须贺，据说那天好象是B29首次轰炸东京的日子。

回到日本感到很惊奇：‘内地怎么如此安闲？’我先在御文库向陛下作了汇报，然后在一个月里有二十五、六次向内阁会议、次官会议、海军、陆军等各方面作了报告，讲述拉包尔的态势，此后便专心考虑作战问题。在整个12月里，飞往菲律宾、台湾、冲绳，进行实地考察，然后回到冲绳。我决定在这里进行令敌人吃惊的攻击，我认为这在当时是可行的。但陆军反对。

陆军觉得，过去被海军牵着鼻子往各处岛屿派兵，孤立无援损失极大，已经吃尽了苦头，因此主张不在冲绳，而在本土决战。也许是枉费口舌，陆军与海军的思维方式根本不同。概而言之，陆军持有‘精神一到任何事都迎刃而解’的精神至上主义色彩；而海军虽认为需要精神主义，但此外还要依据理智、数量等理论。陆军是以人为中心的，而海军以物，即军舰、飞机为中心，所以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得已的方面。

那怕是本土决战！陆军参谋本部的口气相当强硬。但这是精神至上主义的强硬，把愿望与客观事实混同，因此而作出的判断，恐怕大多数情况下是错误的。陆军虽然可以精神一到决然行之，但海军的性质决定了缺少军舰和飞机是不行的。在战争失败的情况下，陆军与海军之间不协调，产生了齟齬，并集中在冲绳决战的问题上。我们认为冲绳是最后的机会了，但陆军踌躇不定，冲绳决战推迟了两个月之久，种下了冲绳决战失败的祸根。

在冲绳，不仅未投入兵力，相反却调冲绳之兵到台湾，因为陆军错误地认为敌人也将在台湾登陆。从而冲绳的兵力不足以在

海滩击退敌人，只有让敌人登陆，再采取‘玉碎’战法。对此牛岛君一定会感到遗憾的。

更难以容忍的是，陆军没有举全力进行冲绳决战。冲绳应该是‘决战’，准备虽已延误，但一俟决定决战时就应该投入全部力量。海军不管怎么说，连最后的‘大和’也投进去了，但很难说陆军已全力以赴。就是‘决战’，陆海军的想法也不尽一致，分歧来自是海战还是陆战的争论。不管怎么说，冲绳之战因此而失败了，我觉得战势已无可救药。

其实，在冲绳决战之前，我们怀有一种期待。冲绳是在6月陷落的，在那以前的2月到3月间，美国在硫磺岛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所以我们想，能否乘此机会，试探有无与美国和谈的可能？能否将此看作是局部解决战争的机会？可是，当事态如此发展时又感到惊讶了。那时，艾伦·塔雷斯在瑞士与藤村中佐进行了接触。藤村君给军令部发来密电：‘为了进行正式谈判，请派海军大将来中立国。’我吃惊的是与我们的期待不谋而合。然而遗憾的是，不知艾伦·塔雷斯何许人也。说信吧，又觉得蹊跷，尤其是指定海军大将，使我觉得像是某种圈套。这是离间陆海军的谋略？还是诚心试探和谈？抑或是想影响我国的舆论？使我难以决断。

现在想起来，那大概是真的，因为美国对苏联坐收渔利怀有戒心，并感到不安。如前所述，我们的想法是局部战，但无法得知解决的条件。于是我向军令部总长及川古志郎先生说：‘那怕是骗局也不要紧，派哪位大将去走一趟吧。’我想及川先生是会听我的意见的，不料他却严厉地训斥说：‘你研究你的作战就行了，别谈政治！’我不得不缩了回去。”

最后的军令部总长

“但是，在本土决战的酝酿阶段，我们就已经抱着孤注一掷的绝望情绪。到那个时候，‘物’方面已损失殆尽了，实行本土决战

必危及于‘人’，人的伤亡必然是不堪设想的。轻举妄动，有可能使日本人自相残杀。所以，本土决战怎么说也是下策。我虽这么想，但也只能着手准备。

在此期间，广岛落下了原子弹。其实海军也曾研制过原子武器，但赶不上了；所以又转向杀人光波的研究。大约在沼津附近有个研究所，听说已能在相当距离杀死老鼠之类的动物。我对原子弹的知识一无所知，就觉得大概其威力无比，像是同时落下成千上万的炸弹似的。如果是那样落下来，危害的程度将不堪设想。但这一来，清楚表明了最终阶段的来临，促使人们去考虑终战。这里，我想谈终战时军令部的动态。

在冲绳战已不行了的1945年5月29日，人事又有了新变动。在军令部里，新总长由原联合舰队司令丰田副武担任，及川总长调任闲职的军事参议官；新次长由大西泷治郎担任，原次长小泽治三郎中将出任联合舰队司令。

先谈谈及川先生与丰田先生这前后两位总长。及川先生是个了不起的学问家，尤其爱读汉文书籍。据说他在出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时，手不曾离开过汉文书。我到总长室，也总见他手不释卷，以至于我想，如果说他是勇猛的武将，毋宁说他是斯文的学者，尤其是东方哲学方面的学者。也许是这个原因，及川先生很好说话，但我未曾从他那儿听说过有关作战的新构想。

丰田先生任第二舰队司令时，我作为前任参谋曾侍奉他一年左右，他是个对花草之类兴趣索然的人。但是好责备人。也许因为聪明，极细小的事也能察觉。在布里基指挥时，甚至吃饭时也唠叨不休。以至于副官都对他感到厌烦。我为许多人工作过，他大约算海军中的一个啰嗦的将领了。他在任军令部总长后，虽然因工作上的事也有责备我的时候，但过去那种唠叨劲没了。关于这次人事调动的缘由，丰田先生在他的遗著《最后的帝国海军》中有这样的话：‘我觉得米内先生是做终战工作的，所以要我当他的伙伴。’我也这么认为。丰田先生本身就是军务系统的人，所以

这么认为是合乎逻辑的。与及川同样，他也不是第一线战将型的；与学者型的及川不同的是，他可谓军政方面的海军大将。那时的米内已完全是‘政治家’了，丰田虽说不上是‘政治家’，但其思想与米内很相似，所以让丰田做了总长。但令人不解的是让大西君做了丰田之下的次长，使人觉得惊讶，因为大西是彻底的抗战论者，是海军中首屈一指的强硬派。但是，起用大西，还是有其理由的。”

和战兼顾的人事

“为迎接终战，米内海相任命与自己的合理主义主张相近的丰田副武为军令部总长，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为什么又任命强硬派的大西泷治郎为次长呢？我是这么认识的。”

富冈定俊氏继续说：“米内与丰田两人的想法是比较接近的，听说从反面考虑，又罗致了与丰田回然不同的大西君。这次人事变动在5月底，当时已是冲绳战的最后阶段，航空特攻战斗方酣，形成了高潮。大西是航空特攻队的催生婆与创始者。为在将临的本土决战中控制特攻队，所以需要大西。”

显然，那时的米内尚未能专心致力于终战，在和战之间首鼠两端，至少在表面上必须摆出一副决战到底的架势。不管怎么说，丰田任联合舰队司令已经一年，却又很快调动，并由军令部次长小泽君接替，人事上就象轮流作庄似的。当然我对米内的看法是含有许多推理性的猜测的。

丰田在《最后的帝国海军》中写道，在他任命军令部总长不久，米内对他说：‘既使导向终战，军令部里就能安然无事吗？’

‘由我负责！’他这么回答。

能否承担起责任又当别论，我想在事实上军令部也同陆军一样，是由强硬派支持的。强硬派的核心就是大西君。当时我虽知之不详，但大西不仅向米内、也向其他的阁僚四处奔走游说，他

知道终战将临，却为继续战争的工作而到处活动。我想，确如丰田遗著中所说的：“说我主张战争进行到底，鼓吹这种过分的要求的说法，是对我的误解。”但这只限于丰田，在外人看来，军令部的动态是强硬的。所以大西觉得丰田已不行了，他自己四处活动，这使得米内也难以容忍，据说斥之为“不谨慎”。

确实从整体上说，军令部比起米内他们更加强硬。但这种强硬又不同于陆军所主张的实行所谓“玉碎”的本土决战。海军出于传统的考虑，把战争看成是局部战争。

在5月9日深夜到10日凌晨举行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上，丰田与陆军的阿南陆相、梅津参谋总长一起反对接受《波茨坦公告》，而与主张不得不接受的米内相对立。于是，海军省内也分成两派。人们认为军令部与陆军一般无异。我十分了解丰田，我想说不是这么回事。丰田决不反对终战。但《波茨坦公告》上没有明确天皇的地位与待遇，这是需要明确的。因此，丰田认为为确认这一点，还需要时间。”

通向终战的大布局

关于终战时海军的军政方面，我们来听听处于中心地位的保科善四郎氏（当时的海军军务局长）的谈话。保科与作战的军令部的考虑根本不一样，实际上，保科帮助米内海相，为推进终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说来也许不信，我是为终战而任海军军务局长的。这么说没有丝毫居功自傲的意思。所以如此，完全在于因缘。在更早以前，即1943年5月，当时的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大将，就要我给他当军务局长。那时我是兵备局长，我听了他的话后心里琢磨，这是要终战，他的意思是要我为终战尽力，因为军务局长是军政的总管。要说听到岛田的意见，怎么就会想到终战的呢？这是因为战局有了转机。在那前一年1942年的中途岛海战中，我们打败

了，同年又不得不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悲惨地撤退，而且在我接到此意见前的一个月（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元帅又战死了。对于我们海军军人来说，也许一般的国民也是如此，山本联合舰队司令是作战用兵的王牌，所以，他的战死使我们悲痛不已，并接受了这种残酷的现实。况且，我是后方的军备局长，十分清楚海军的战斗能力，这时再要打下去已经不行了，是该考虑结束战争的时候了。所以岛田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就马上想到了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要从政治方面寻求对策，事不宜迟，否则贻误时机，将不可避免地走上毁灭的道路，我是这么判断的。

1943年5月5日，为了了解当地实情，我和我的18位有专长的部属，乘专用的‘二式大艇’，飞到了拉包尔。途中，因为新任联合舰队司令古贺峰一大将在特鲁克岛，所以顺道去拜访了古贺。古贺先生是我在海军大学时期的教官，以后也常常承蒙他的照顾，是很熟悉的人。飞机降落在特鲁克岛后，来到了长官的旗舰，大概是‘大和’舰。在长官室里，我和古贺两人畅所欲言地谈了许多，我阐述的意见是：‘我觉得在现在的情况下越早终战越好。舰队的动力——石油，虽说很紧，但目前还充足；敌方的机动部队现在又正好在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附近游弋。如果我们海军用全部舰队和石油在这一带展开伏击战，就敌我现存战斗力看，不见得我方就会失败。虽说胜负难测，但无论如何海军有了终战与否的主动权。’

古贺长官默默地听着。‘我同意你的看法。’他这么说，然后又说：

‘我作为联合舰队司令来到这里，实际是指挥西南太平洋地域的作战，我明白我们的战斗力十分薄弱。很明显，再这么打下去将会一无所有。你所说的决战固然是有道理的，但对我来说，趁现在还留下一些战斗力，还有重建的能力，趁早终战为好。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不反对终战的。’

那个时候，塞班岛尚未陷落，况且也没有空袭东京战。当然

我与古贺长官的谈话内容，没有对随从的幕僚们说。我们到拉包尔后，见到了陆军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大将，听了他的情况说明。正在此时，1943年5月29日，传来了阿图岛守备队‘玉碎’的悲惨消息。海军省因此来了急电，要我马上归国。如果没有阿图‘玉碎’的刺激，我归国后打算再与岛田大臣和古贺联合舰队司令谈谈关于终战的事，但因为有了这件事的刺激，我的军务局长赴任也延期了。

但是，海军并未改变和平的想法。在作战中给敌人以坚决的打击，即便不能很快地创造出有利条件，但海军仍然具有充分的余力。为发挥这种余力的作用，这次变了方向，决定由海军次官冈崎敬纯中将主持斡旋‘德苏单独媾和’，但那时，我仍然是军备局局长，如果直接间接地去推动和平工作，也许会有杀身之祸。

这个新提出的‘德苏单独媾和’的课题，是通过德国驻日海军武官乌依纳格进行的，想首先策动德国海军和平。事情的进展甚至策动到了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但那时正值斯大林格勒德国惨败不久，希特勒看来不会马上答复，结果以流产而告终。

我是在1945年5月15日，即铃木内阁成立一个月以后，就任军务局长的。米内先生为了终战而起用我。我首先让麻生海军中佐当米内先生的秘书官，这是作为米内的护身而配备的，他干得很好。想起那时海军的情况，首先浮现在我眼前的是次官井上成美中将（1944年7月17日到1945年5月14日为中将，以后是大将）。他在小矶内阁时帮助米内，对于团结海军有很大功劳。我想正因为有他，才使后来的海军首脑人事变动，即便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海军内部也显得很平静。

在井上君的具体安排下，我就任军务局长不到两周，联合舰队司令丰田副武调任为军令部总长，由小泽治三郎军令部次长接任联合舰队司令之职，再由大西泷治郎君接任军令部次长。

大西君本来是不适于参谋系统的第一线指挥官，并且是闻名的强硬论者。在这个时候他担任军令部次长的要职，海军便在人

们面前摆出了要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姿态；与此相反，在我任军务局长后，又由丰田任总长，可以说，在海军中布下了终战的大布局。

我的军务局长的职责，与陆军稍有不同，不仅要从事原来的军政工作，而且还要涉及到作战方面。因为当时撤除了兵备局，其职责作战准备，即装备、兵站等责任就由军务局长承担了，所以工作极忙。因此增设了次长，由高田利种少将任次长，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遗憾的塔雷斯计划

“海军的几位首脑真正开始认真地考虑终战问题，是在美军占领冲绳不久。

‘给我研究一下，怎样才能夺回冲绳？’米内大臣当时向我出了这么个课题。井上成美次官好象也向我作了同样的指示。我一直担任着兵备局长，了解装备与兵站的工作，我粗略地估算就感到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要夺回冲绳，首先要输送兵力，这至少需要千艘以上的大型渔船，海军的军舰几乎荡然无存了；而且必须增强两个师团左右的兵力。这根本就不可能。

由于塞班岛的陷落，现在冲绳又被占领，粮道被断了，所以国内的居民几乎过着穴居的生活。因而，除终战外，别无他途。大臣心里是很明白的，夺不回冲绳就必须终战，这是明摆的事。所以，大臣在抗战派眼里就象仇敌一般，虽然没有出现具体的‘事件’，但这种气氛是能够深切地感觉到的。我无论到那儿，常常听到从各方面来的，不知是希望还是威胁的话：‘要使大臣成为继续作战论者！’我佯装不知的承应着，但总有一种切肤之痛的危险感。

不管怎么说，冲绳是不易夺回的，海军最后的战列舰‘大和’及第二舰队，虽想突入冲绳，但在抵达冲绳前的4月7日被击沉

了。正好这时铃木内阁成立，米内留任海军大臣。在那一个月后的5月15日，米内发出了要我任军务局长的任命。作为就任后的礼节性拜访，我去看米内，大臣说‘陛下有意停止战争。’这句简短而平静的言语，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大臣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这从大臣自己的眼色中就已一目了然，不必再借助于口舌了。

围绕着终战问题，我们把米内和阿南作一个对比。他们俩必然都在考虑终战问题，但陆军和海军制度不同。海军易于统一，陆军则相对困难。我想，这就是他们俩人的差别。对此，我在6月初兼任大本营统一部长时有切身的感受。

为建立陆海军关于怎样进行战争的统一政策，我出席了大本营的所有会议并参与筹划。我几乎天天与陆军的军务局长吉积正雄中将交换意见；在统帅方面，军令部次长大西君也常常与参谋本部的河道虎四郎中将联系。虽说人们认为陆海军势如水火，但首脑们还是能够很好地共事的，只是我觉得在这场战争中，在莱特海战以前海军握有主导权，以后因海军军舰丧失殆尽，力量极弱，所以势必增强陆军的发言权。

也许是出于我本人的偏见，我觉得在陆军中，比起在陆军省来参谋本部的势力更强。当然，阿南陆相与梅津参谋总长的心情是相通的。但尽管如此，假如阿南在正式场合表明想要终战，省与参谋本部之间必然会明确分裂。人们知道，阿南以前做过侍从武官，他很了解陛下的心情，他也知道铃木总理的本意，所以我觉得他的处境微妙而又艰难。

而海军在这方面、即军政与统帅的问题上，与陆军稍有不同。海军在传统上是以大臣为中心的，大臣掌握着人事权，虽然最终要经过军令部总长签字，但大臣个人可以决定人事调动；如果说不能说服军令部总长和次长，大臣可以罢免之。但陆军则不同，大臣即使能够罢免次官，也不能撤换参谋总长，最高人事需要三长官，即大臣、总长、教育总监同意才能变动。而且对海军来说，米内大臣是全体海军都心悦诚服的元老，当然容易统一；这方面，

陆军显然就不一样了。

典型的例子就是‘藤村、塔雷斯工作’。海军认为这是通向和平的绝好机会，但因陆军反对而无法进行。虽然移交给了外务省，由于耽误了时间而流产了。

现在想起来，我们仍不太了解谈判对手艾伦·塔雷斯。原因之一是对人的研究不足，但此事并非由海军单独处理，要与陆军和外务省商量。塔雷斯伸出的橄榄枝的内容是在苏联参战时日美单独媾和，其条件是日本领土保持现状，使满洲独立。我们认为条件是不错的，但陆军和外务省觉得这是谋略。塔雷斯通过在瑞士的海军武官藤村提出，要我派海军大将去谈判，这被认为是离间陆海军的谋略。陆军甚至说，海军竟要干巴特里奥那样的事。由于无法影响舆论，海军只得作罢。

在海军中，米内对此赞成，丰田总长原则上也赞成，只有次长大西反对。因为大西君原来是强硬论者，所以陆军也赞成的话，我们打算认真地试一试。但是陆军，尤其是参谋本部强烈反对。后来知道，这也涉及到制度的差异。驻外武官，陆海军都是由统帅的参谋本部或军令部指示方针的。陆军武官，参谋总长具有绝对的指令权，但海军武官形式上是军令部总长指令，实际上强烈地反映了大臣的意见。就是说，陆军即便省里赞成，但参谋本部反对仍不能实行，海军则省与军令部能很快一致。武官在某种意义上是搞外交的，这种外交在陆军就由参谋本部掌握，所以很难一致。那个塔雷斯工作，现在想起来仍感到遗憾。”

军令部的“地下指挥所”

过去的军令部与海军省，都在和大审院(今法务省)并排的西侧的大楼里，那是一幢与大审院一模一样的、砖瓦结构的优雅建筑物。在空袭时，也许有人觉得军令部无影无踪了，其实，其主体已转入地下，就在从日比谷图书馆通向国会议事堂的宽阔的道

路下面，恰好是在现在的通产省和农水省之间。这是一个有三层的大规模的地下建筑，能够承受一吨以上的炸弹的袭击。作战室、会议室、舰政本部都在这里，通过电缆，与在日吉的庆应预科校舍地下的联合舰队司令部联在一起，指挥着整个海军。战后，在重新修建现在的通产省时，听说在拆毁用混凝土加固的凸出的出入口时费了很大的劲，但其主体因为在下面，谁也无法移动，迄今仍静躺在霞关的地下。

在终战之际，这里每天都聚集着大臣、总长、次长、军务局长等海军首脑，研究作战状况并开准备会议，商议终战的办法。我们再接着听听时任海军军务局长的保科善四郎中将有关此事的谈话：“这个建筑叫做‘地下指挥所’，或者‘防弹室’。起初据说能承受500公斤炸弹的袭击，经过强化1吨也能承受。具体的房间布置已经不记得了，只觉得是个很大的场所，其中有海军大臣的房间，也许是以备万一之用的。米内的官邸大约是堤康次郎提供的，在小矶内阁时代进行对华和平工作时，作为秘密使节来日的缪斌曾住在那里。

到了6月，通过苏联居间调停的和平方案出笼了。据我所知，米内先生的考虑是不通过苏联，而直接与英国进行和平接触。但一则我与苏联有中立条约，再则由苏联进行，陆军也能接受，所以就决定了‘苏联居间调停’。但米内对此毫无兴趣，也不寄予希望。大臣在年轻时，曾作为武官在莫斯科驻了3年，熟知苏联人的思维方式，是海军中的苏联通。但是在那样的形势下，我记得米内对于派近卫特使赴苏不置可否。苏联是否接纳近卫特使，迟迟不见回音，正当人们感到情况不妙的时候，《波茨坦公告》发表了。对于《波茨坦公告》，我记得大臣的考虑是只要能维持国体，就以接受为好。

就是说要立即终战，米内先生虽未明言，我们也能会意。但遗憾的是，战争的主导权实际上已移向陆军，海军与陆军就终战达成一致意见是不可能的。从大臣在暗中特命高木惣吉少将进行

‘终战工作’一事，可知海军实在是没有主导权。

在此期间，广岛落下了原子弹。但对海军来说，根本就不知道原子弹爆炸的严重性，所以，也没有因此就考虑立即走向终战，只是觉得终战是很不容易的。接着苏联参战了。我印象很深的是大臣这时对我明确地说：‘终于是终战的时候了。’我想，这是第一次从大臣的口中听到‘终战’这个词。”

终战工作的战争指导班

人们常说，在终战工作上，海军与陆军不同。但“终战工作”并非暧昧之词，当认识到败势，当然主张早日终战，从广义上讲，可以说大家都在从事终战工作。本来，终战是最高政治问题，决定与否取决于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即总理、外相、陆相、海相、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 6 人的一致意见。可是，6 人的心思并不一样，要使之一致就要使用心计，或称“腹艺”（日本戏剧中不用道白和动作来表示自己心情的手法，这里有暗示之意——译者），而且他们的支持者又遍布公职人员和其他人士之中，所以要全面地描述这项“终战工作”是极困难的。因此，这里所说的海军的终战工作，只限于具有海军编制专门从事此项工作的人，而且在工作性质上，其所从事的是为终战工作的步骤进行具体的设计，并为之实现而努力工作的人们。由此可以窥视出终战前夕海军部内空气之一斑。首先，在以专心作战，不干涉政治为原则的军令部中，就有从事这一工作的部门。我们听听当时的海军军令部作战部长直属的战争指导班班员新田善三郎少佐的谈话：“说起军令部战争指导班的终战工作，对于敌方谍报人员来说，也许总觉得这是个机构庞大的组织。我们的工作也确实多变，而且对军令部的同僚也是保密的。其实这谈不上有什么组织，仅仅只有两人，至少在军令部是如此。甚至，我在作此工作前，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我原是战列舰‘大和’号的发令长，经历过马里亚纳海战、菲律宾海战等；以后又调任航空母舰‘天诚’号，在濑户内海的松山海面上，指导航空母舰舰载飞机的着陆训练。1945年2月，发布了让我去军令部作战课的任命。我心里极不情愿，因为那时的作战课只剩下特攻作战的工作了。并且，在松山训练的实际所见，我了解驾驶员的技术，他们都不能在母舰着陆。当时为了不毁坏这一点点珍贵的飞机，只得拜托了松山基地的源田美航空队长，借了地面飞机场进行训练。到作战课，就是命令这些未成熟的青年特攻队员出击，毫不怜悯地发出让他们送死的命令，这是我极不情愿的。

我一到军令部，虽然兼任作战课员，但说是要我从事战争指导班的工作。战争指导班班长是柴胜男大佐。在战争指导班、班长称为甲部员，还有乙部员、丙部员各一人，共3人组成，那时尚缺乙部员，所以只有甲部员的班长和丙部员的我两个人。‘到底做什么事呢？’我问道。于是柴君拿出事务分担表说：‘战争指导的工作是很多的，有针对敌方的、也有针对国内的。而我们现在从事的工作，是针对陆军和国民的，就是说是退后的战争指导。’柴君尚未说完，我就恍然大悟了，我感到这是终战工作。话虽然这么说，但我是在1938年入伍的海军兵卒，这时也才30岁，在30人左右的作战课里是最年轻的，而且军阶也最低，是少佐，又不是海军大学毕业出身。不过海军大学在开战不久，一般学生就不让进了，想去也去不了。但当时在作战课，非海军大学毕业的参谋，只有我和植松盛太郎少佐两人，所以心感不安，不知能否做好这么重要的工作。

我们这些人只学习过如何从事战争，而未曾学过怎样结束战争。当然在人事局里，总是按适应性与能力来发布任命的。在我们同期的海军军官中，第一等的是驱逐舰长，第二等的是飞行队长，第三等的战死，第四等的就像我这样没有突出成绩的。但由于我的岳父是藤田利三郎海军中将，柴君在海军大学的时候是藤

田的弟子，藤田常常给柴君以照顾。话归正题。我与柴君在一个办公室里，按柴君的命令工作。开始时去得最多的是外务省，我从政务局第四课长牛场信彦、第一课长曾祢益、第三课事务官曾野明那里，了解了各种情报。

但是，在菲律宾海战失败后，渐渐地就进入了工作的主题。那时，菲律宾总统劳雷尔一行亡命日本。在何处安置好呢？与外务省商量的结果，把他们安排在奈良的奈良饭店。记得那笔费用是从我们的机密费里出的。

德国战败时，在日本与日本占领地的德国军人，全被收容于神户的六甲山饭店和箱根饭店等处。军舰是国有财产，所以全部没收；商船是私有财产，以后要还给人家，所以调查了占领下各地的商船，登记了所在、船名、吨数等，做了财产目录。

那以后，重庆‘特使’缪斌因终战工作来日，于是就有了诸如在何处与日方代表会面等繁杂的事情。结果不知是因为陆军方面的反对，还是由于缪斌信誉度太低的缘故，此事又告吹了。

在上述琐碎事务中，最难忘的是那以后的藤村、塔雷斯工作。驻瑞士武官藤村义朗海军中佐，给作战部长富冈打来密电。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紧张工作。与藤村中佐商量的密码电报就是我拍发的。我现在仍记得这些电文的内容：‘塔雷斯希望军令部总长作为日方的谈判对象。’对此，军令部的回电是：‘总长不能去，次长如何？’与此同时，我与柴君商议，如果决定谈判，用什么方法把日方代表送往瑞士？我们设想，先把日方飞机涂成白色，在机身上写上绿色的十字，代表乘此飞机到印缅边境的阿卡布，再由美方飞机来接，并且要求彼我双方都指示前线各地，不得击落飞机。但这只是纸上谈兵，结果并未实施。但尽管这样，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

我们虽然只做事务性的琐事，但已感觉到渐渐地在开始进行正式的终战工作了。当然，军令部的战争指导班，不是从事终战工作的机构，但由于战局与形势所迫，军令部也不得不部署此类

工作，这样就往往由战争指导班来承担了。

在送近卫特使赴苏工作之际，似乎我自己也成了秘密谍报员，与对方国的人员进行了接触。”

对苏联武官的刺探

新田善三郎氏继续说：“参谋本部也有战争指导班，但它是推进对敌方作战的；而海军的机构则与此相反，是做终战工作之类的后退的工作。海军在战争中损失极大，几近于毁灭，陆军则不然。陆军虽然遭到了象缅甸那样的大损失，但在本土尚有百万军队，也许他们觉得尚未失败。

我常出席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因为由我草拟有关终战设想的文件（我们只有两人、这事也落在我的身上了），所以我随军令部总长丰田先生到了干事室；但这些计划由于陆军的反对告吹了。陆军赞同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派遣近卫特使赴苏。因为在冲绳战败后，随之就是本土决战了，在这时陆军忌惮苏联的参战，迫于形势，所以勉强同意。但是，苏联怎么也不许近卫特使赴苏，这使我们颇感不安。‘为什么？请去探探原因。’柴君对我指示道。

当时的苏联驻日使馆有位武官叫罗吉诺夫，是海军大校，住在三田；还有位翻译叫尼古拉也夫科克尼。我不通俄语，所以先与翻译接触。当我问他有何所好时，答曰喜欢看电影。于是我说：‘那就给你弄张东京各影院通用的免费入场券吧。’与各电影公司谈了后，给了他一张通用入场券。我又进一步问：

‘罗吉诺夫大校有什么爱好呢？’

‘他说特别想看电影制片厂。’

‘这事我来办！’

我到当时的东宝之砧制片厂厂长森岩雄先生那里，拜托他，并对他说：‘光看拍片是不行的，还请准备宴席。’

我带着罗吉诺夫大校到了制片厂，请来了女演员，举办了晚

会，使他玩得很高兴。那以后，他就请我到他三田的家中吃晚饭，我终于如愿以偿。

那次，我们喝着供应的酒，我装得烂醉如泥、拐弯抹角地向他刺探，他不在意地、暗示似地说：‘广田在苏联的人缘不行，所以先派广田交涉是很难得到签证的。’我听了后不知其所云，当向柴君汇报后，方才明白，在决定派近卫为特使赴苏联之前，广田弘毅先生与苏联大使马立克之间，即曾作过刺探。但为何拒绝近卫特使，我们仍然不得要领。无计可施的柴君停了一会儿开口说：‘你能否不以军人身份、直接到苏联去？’据说作为给国外使馆传送外务省文书的信使，可以到莫斯科去，我也就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到苏联大使馆请求签证，但一眼就被识破了。现在想起来真是笑话，从心里觉得这不是军人该干的工作。”

呈报结束战争

以米内海相为首的海军首领们，开始筹划着终战，并命令军令部的战争指导班等单位，悄悄地进行终战工作。那么，一般的海军人员又怎么样呢？致力于终战这个与政治相联系的问题的是军务局，其核心又是军务局第二课。海军的军务第二课就相当于陆军的军务课。陆军是彻底抗战派的大本营，甚至终战时叛乱军的首谋者也出于此。与此相比，在海军军务第二课里，平常便能随便使用“终战”这个词，由此可见，对于终战，陆海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为对军务局长保科善四郎中将前述谈话的补充，现在就来听听时任军务局第二课课长的末泽庆政大佐的谈话：

“军务局共有4个课：第一课军事、第三课舰船整備、第四课宣传，我所在的第二课是根据省令制定国防政策。所谓政策，一般地说，涉及的范围说窄就窄，说宽又极宽。例如，我们既研究国际上的三国同盟问题，又要从事国内从粮食到各省间的交涉等头绪繁杂的事务。我走的大致上就是军务系军人的路。”

我自1941年4月任军务二课课员后，就长期在此工作。其中一度于1944年1月出任巡洋舰‘那珂’号舰长。但一个月以后，‘那珂’号在特鲁克海面被敌机击沉，我也受了重伤，在九死一生中脱险归国。归国后，成了军令部战争指导班长。这里所从事的是与二课相类似的工作，那时尚未着手后退的终战工作。以后，在1945年3月，转任军务局第二课课长，当时曾向米内海相说明战力的实情。记得这位沉默寡言的海相，满腹牢骚地说：‘把人与物全耗完吧！’

以如此低下的战斗力，能给敌人以期望中的大打击吗？这么一想，危机感就油然而生。我虽然从事‘国防政策’的工作，但从那时起，我开始觉得必须想方设法收拾事态。我觉得不仅我一人持有这种想法，包括军务一课在内的整个军务局，都充满这种气氛。但又都心照不宣地觉得，如此要有个大前提，即要给敌人一次沉重地打击，使我处于较有利的地位后，再谈终战问题。这种对终战犹疑不定的考虑，与终战工作完全是两码事。在此期间敌人必然在冲绳登陆，我将竭尽全力进行了反击。果然，不幸被我言中了。于是，我断然向保科局长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当时的语句已不清晰了，记得写了有五、六行字的意见书，大意是：‘我以为，在冲绳作战好转之机，可速推进战争终结。’我一拿到保科局长处，局长说声‘好’就‘啪’地盖了章，于是循级递给了大臣，大臣用惯常的缓慢语调对我说：‘关于战争终结问题，有以总理为首的战争指导会议的6成员考虑，即使是陆海军的次官也不得稍有涉及。你的意思我已明白了，但对此问题我们还是不管为好。’

虽然我受到了大臣的责备，但总算将自己的意见反映到了他的耳中；但又觉得不能这样就算了，于是随后就把课员们召集起来，对他们命令道：‘在冲绳战斗好转之际，我们该采取什么措施，或者说在冲绳战这个对我方来说，是很悲观的情况下，该如何应付？请诸位在各自的立场上自由考虑，向我提出各自的观点。’‘难道能好转吗？’立即有位课员反驳说。

诚然如此。但是，又不能袖手旁观。于是，根据我先前的想法制定计划：与苏联交易。”

与苏联换飞机

末泽庆政氏继续说：“记得6月以后，大本营的大佐参谋高松宫殿下附属军务局，并在这里设了办公桌。我因事务关系，也时常与他交谈。有一天，当办公室无人的时候，他轻轻地走到我的身旁问我：‘二课长，你对战局是怎么看的？’我想他可能知道我给大臣的呈文，因此才这么问我，所以我仍按原意这么说：‘我考虑在冲绳之战中取得大战果后，以此为契机实现终战。’殿下听了后说：‘我也这么认为。’然后我们聊起了冲绳的战况，攻击冲绳的鹿屋特攻基地的事等等。正谈到冲绳之后怎么办时，因有人来而打住了话头。我感到了殿下对于冲绳之战的极度忧虑。

冲绳战失败后，接着要本土决战了，对此军务二课该考虑什么呢？

如前所述，二课的职责是推进国防政策的设计，范围当然是极宽的，课员就有7人、包括国外班的美、英、德、意、中各1人和国内班的2人。敞开思路来考虑问题，时常会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我在呈文中提出‘在冲绳战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以此为契机进行终战谈判’。即使冲绳战失败了，在本土决战中还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的机会，只是没有相应的战力了。必须想方设法取得这些战力，但事到如今，在国内已无法筹措，只有从国外着手了。于是想到要利用苏联。

我国与苏联之间有中立条约，苏联至少是非敌对国的唯一强国。苏联取得对德战争胜利后已不需要飞机，而且利用大战的经验、定能制造新式飞机，这样，其在此次战争中使用的飞机就更无用处了。再则，苏联海军力量较弱，我读过松冈洋右在莫斯科缔结《日苏中立条约》时（1941年4月13日）所写的关于斯大林对海军有

强烈兴趣的报告。而我方更需要飞机。所以，当时调查了我方剩下的舰船，发现未毁坏的还有战列舰‘长门’号，最新式的巡洋舰‘利根’号、旧式航空母舰‘凤翔’号，以及一些特型驱逐舰。我想把这些全部交给苏联、与苏联交换带燃料的飞机。

我将拟好的这个方案，拿给了保科军务局长，保科君稍稍想了一下，说声‘行！可以一试。’就立即给盖了章。但问题是怎样使苏方能够接受。稍一琢磨，就觉得这纯是一厢情愿。当然，此方案完全不同于更上一层所进行的广田、马立克会谈，和派遣近卫特使等。首先我们不了解上层对日苏接触的策划，我的方案只是军务二课的设想。在某位重臣的记录里这么写着：刚听了几句关于用军舰与飞机交换的话，觉得这是极笨极笨的徒劳挣扎。我现在一想起来，就感到脸红。当时的心情，就象溺水者抓稻草一样，这么一想觉得也情有可原。我们不只是想想而已，有了局长的印后，就着手进行了。

以什么方式与苏方取得联系呢？按常识接触的步骤是，通过在莫斯科的日本驻苏大使馆的武官，并劝说在东京的苏联驻日大使馆的武官给予支持；在民间渠道，派重要的政治家去苏联。我们想首先要驻苏大使馆武官，与苏联交涉派遣重要人物的事，于是选择了经验丰富的海外武官横山一郎少将，办了签证等准备入境的手续，先让他去哈尔滨伺机待命。民间渠道借重日鲁渔业社长平塚常次郎先生，他与当时的苏联大使马立克关系较好。苏联驻日武官方面，则由我们自己去接触。

就重要政治家而言，与斯大林有些友谊的前外相松冈洋右，当然是第一人选。我们多次叫来松冈先生在海军运输本部的儿子，拜托他去劝说父亲，恳请松冈先生出任赴苏特使。我们做了这方面的计划，虽迟了些，但还是在盖了局长的印后呈递给了米内先生。行动开始后，我亲自去劝说松冈先生，但他怎么也不应允。我们多次在一起吃饭、并在吃饭时多次恳求，但松冈先生抱着‘事到如今……’的态度固辞不受。

平塚先生虽然爽快地应承了，但关键的马立克大使却托病不见。

在苏联海军武官方面(那武官的名字记不得了)，我请他去水交社吃饭，谈到了这件事，他圆滑而不置可否地说：‘这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待我向本国请示之后，’他又以娴熟的军人外交官的口吻说，‘回音么，这回由大使馆招待诸位，请你们5月26日来。’

这个日期所以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在此前一天，即25日的大空袭中，海军省被烧毁了。虽然感到困窘，还是给苏联使馆打了个问候空袭情况的电话。‘明天的事恐怕不行了吧?’我问他说。‘没事，大使馆自己发电，请按原定计划来。’那时期自己发电是出乎意料的，也许有些希望，所以怀着侥幸的心理，按约定的26日去了狸穴的苏联使馆，并特意请了横山一郎少将同行。使馆拿出最好的食物和饮料招待我们，谈话也很热情，所以我们抱着一丝期待。然而，据说是‘没有得到本国的训令’，这事又没下文了。

结果各方渠道都不顺畅，所以这个交易夭折了。”